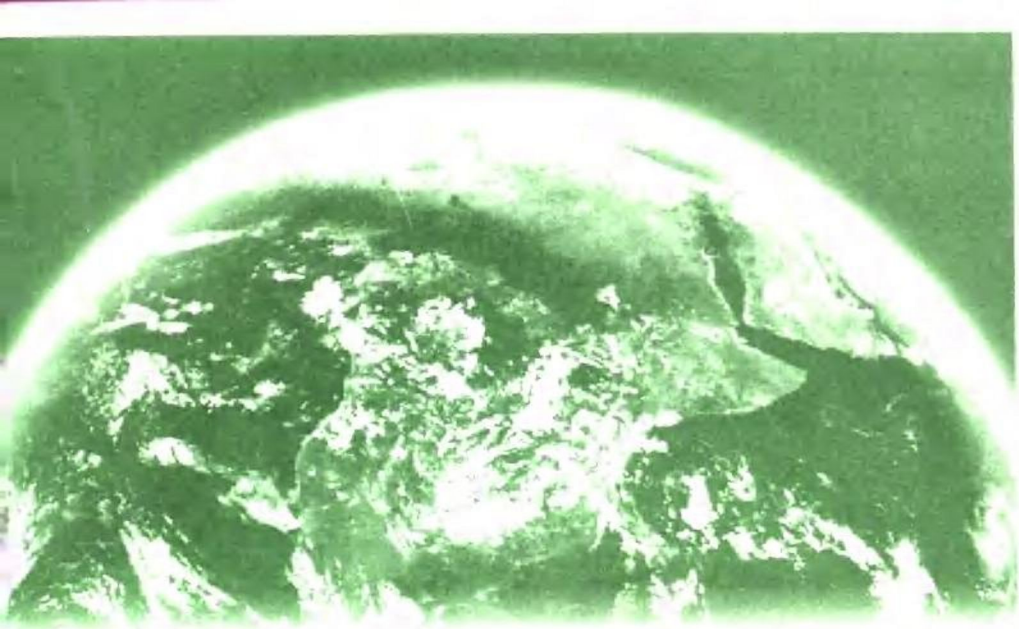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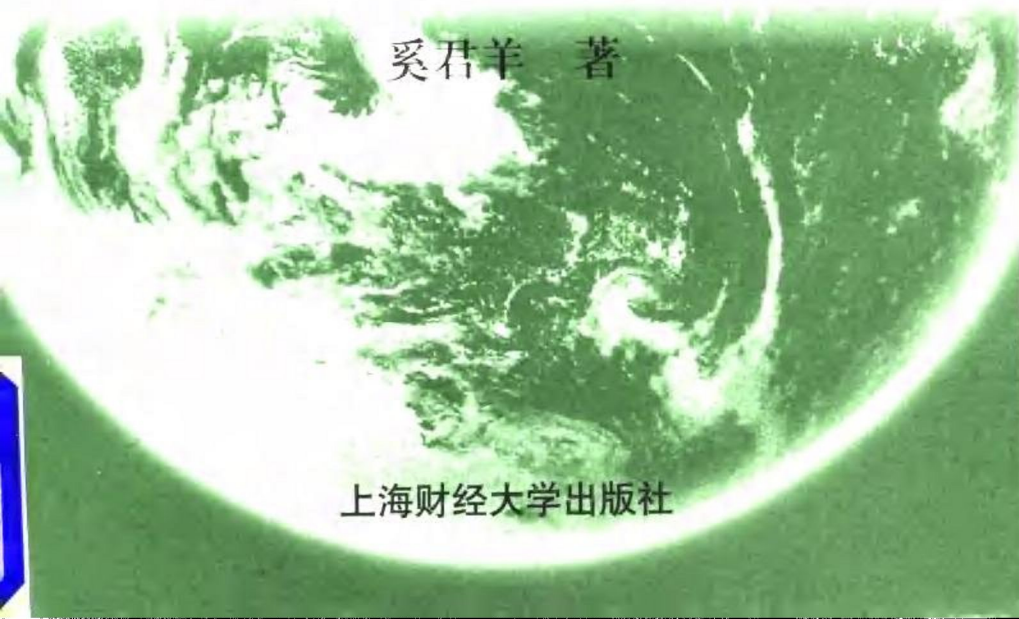




GUOJI CHUBEI YANJIU

国际储备研究

奚君羊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716020
本书由上海财经大学资助出版

国际储备研究

奚君羊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国际储备研究

GUOJI CHUBEI YANJIU

奚君羊 著

责任编辑 黄 勇

封面设计 周卫民

出 版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印刷十厂

装 订 上海浦江装订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32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81049—184—9/F·142

定 价 17.00 元



072131

前

人行研究生部藏书
分类号 F831/820
总号 072131

“地球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人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

于当今世界的信息手段大爆炸和交通运输工具正以惊人的速度而日臻发达。不过在我看来，地球之变小不仅在于自然科学的日新月异，从而使得世界各地的相对距离不断缩小，更在于各民族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在进行和建立相互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和联系。这种交流和联系越是密切，相互的心理距离也就越近。在这种开放的大趋势中，任何一国的命运都将与国际关系的演变融合在一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将近半个世纪里，东西关系一直是左右世界局势的支配力量，因为在东西对峙的“冷战”局面中始终潜伏着“热战”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把战争看作是国际关系乃至人类全面毁灭的唯一的危险根源。只是在最近几年，随着东西关系的根本改善，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日益陷入泥潭，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大规模饥谨、经济灾祸等因素造成的困难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其危险的程度恐怕并不亚于一场大规模的世界大战。以此为背景，与国际关系的其他诸方面（如政治、军事和文化等）相比，国际经济关系显得更具有突出意义。

7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关系不断出现重大震荡：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崩溃；发达国家经济的一度持续滞胀；汇率风波此起彼伏；石油资金东闯西突；债务危机几度蔓延；保护主义再度复萌；东南亚金融局势的突变……尽管国际经济关系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引导下，正以快节奏呈动态变化，但是，只要我们撇开扑朔迷离的表象，排除纷繁杂乱的迷踪，驻足历史的跨度，深入事物的主质，

那就不难发现决定当今国际经济关系演化的一个基本主流,这就是南北经济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南北经济关系演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至于南北关系的其他方面则均是以此为轴心而展开的。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7 年年会”上,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指出:在当今世界的 100 多个国家中,有 30 亿人每天的收入不足 2 美元,13 亿人每天的收入不足 1 美元,1 亿人每天在挨饿,1.5 亿人从没有上学机会。在发展中国家约有 8 亿人生活在所谓的“绝对贫困线”以下,即食物、住房、医疗和教育等维持基本生活的必需品和必需设施严重不足。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虽然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比重不足 30%,但其国民收入占世界比重却高达 90%。

发展中国家在 60 年代至 70 年代期间曾经因为大量吸收外资和增加进口,因而其经济也一度出现较高的增长速度。但进入 80 年代以后,由于债务危机不断深化,外部环境更为险恶,所以,获得大量外资和进口的可能性不复存在,这不能不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严重的恶果。从统计数字来看,自 80 年代以来,非石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始终在二次大战以后的最低水平上下徘徊,仅为 70 年代的平均增长率的半数。例如,1983 年的实际国内总产值的增长率只有 1.4%,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则为 -0.6%。由于经济增长乏力,人口增长却依然保持较旺的势头,结果,人均增长速度更慢,甚至出现负增长。

为了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联合国曾拟订了一系列的计划和设想。然而,即使这些计划和设想能够完全实现,那么,到 2000 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仍将保持在 1:12 的水平。如果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人口比例以及这一比例的剪刀差趋势,那么,这种差距所产生的实际结果显然要更为严重。

缩小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殊非易事,消除这种差距更是困难重重。麦克纳马拉早在1976年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时就说过:“消除南北经济差距并不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即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提高一倍,而发达国家保持其历史上的增长速度,那也要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消除相互之间的绝对收入差距。从现状来看,在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只有7个国家有可能在100年里赶上发达国家,另外也只有9个国家能在1000年的时间里赶上发达国家。”^①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来看,这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不仅作为一种原生的动势依然保持着强烈的惯性,而且还由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作用的不断深化而获得了加速度。只要我们以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作为分析背景,那就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与先进工业国的发达恰恰是构成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组成部分,两者存在互为因果的逻辑关联。

早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西方国家曾利用炮舰政策推行殖民主义,打开了亚非拉地区的门户,并利用大工业的优势,通过不等价交换,在亚非拉国家大肆掠夺原料、侵占市场,迫使这些国家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强行破坏,并逐步沦为专门为宗主国生产某些原料的附庸和制成品的销售市场,从而形成二元化的国际分工结构,以至于发达国家则利用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原料、原材料和燃料生产制成品,并转而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这些产品。因此,殖民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造成南北之间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正是根据这一点,一些西方学者把这种旧秩序称之为“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

但时至今日,贫富互为条件的“因果链”已经打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不仅不会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因,反而是阻碍

^① 参见 A C Frank, "Crisis in the World Economy", 1980, 第 269 页。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因为时代已经不同,发展中国家已经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奴役,它们已经走上了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在这种条件下,发达国家既不能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稳定、廉价的原料供应地,也不可能继续以发展中国家作为其倾销产品的垄断市场。因此,只有打破以二元化的国际分工为特征的、作为殖民体系残余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并在体现南北双方均等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获得较高速度的增长。至于发达国家则也可以在这种新的互相依存关系中使经济得到更快的增长。换言之,在目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衰取决于发达国家经济,而且发达国家经济的兴衰也同样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战后世界经济由美国独霸世界到欧洲、日本的崛起从而形成多极结构,再到发展中国家的逐渐壮大,已经勾勒出了明显的运行轨迹,并由此指明了发展方向。

早在1964年于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第一次贸发会议上,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77国集团”就在宣言中指出:“发展中国家意识到联合国贸发会议是建立一个新的、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的重要步骤。”由此揭开了关于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讨论。然而,由于当时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还相当薄弱,这一要求并未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即使是贸发会议的建立也曾受到美国的反对。直到1974年召开的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才被普遍接受。遗憾的是,个别发达国家的当政人物对南北互相依存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仍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并不愿意改变按自己的意愿来支配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积习,这不仅是因为积习的改变本来就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而且这也为其高傲的自尊心所不容。正是在这样的观念的支配下,这些发达国家力图维持行将分崩离析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竭力反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关键性的倡议,使南北关系始终处于僵持局

面,未能获得应有的长足进展和突破。

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另一重要特点是通行以自由竞争为标记的市场机制。这种市场机制表面看来似乎对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一视同仁,但由于它一开始就是以二元化的国际分工格局为基础的,因而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竞争地位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差。这好比是一场不同重量级选手之间的拳击比赛,虽然比赛规则是对等的,但实力地位却极其悬殊,这又有什么公平可言?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面临的重重困难,就外部环境而言,缘由盖在于此。

鉴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相对恶化的趋势以及国际经济的新的相互依存关系,不少具有远见卓识的国际政治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以及南北关系对整个世界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影响。邓小平生前曾多次指出:“第三世界越发展,和平就越有希望。”即使在发达国家,一些有识之士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困难以及由此对发达国家带来日益加深的潜在威胁也表示了深深的忧虑。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早在1986年就已经预见到:“到本世纪末,肯定地说是到下世纪初,南北冲突从其影响来说将超过东西冲突。”^①发达国家的其他著名人士,如基辛格、勃兰特等人都曾表示过类似的看法,认为发达国家即使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困难。

南北经济关系尤以货币金融关系为最大难点。在贸易方面,无论是价格稳定还是交易数量和品种,南北双方都各有自己的优势。而且这方面的问题较为一般,所以尚存在达成一致意见的余地。如在坎昆会议上,这类问题虽有争议,但并不突出,多少还有所进展。但在货币金融方面情形就大不一样。一方面,货币金融问题直接涉及到资金的安排,进而影响到南北双方的切实利益,因而是解决其

^① 参见《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8月4日。

他经济问题的根本所在；另一方面，货币金融领域在传统上也历来是发达国家控制的世袭领地，发展中国家一开始就处于绝对劣势，缺乏有效的抗衡力量。所以，南北货币金融关系几乎是全然没有进展。但这一问题不解决，南北关系就难以在根本上出现很大的改观。

对南北货币金融关系的完整分析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有关的内容也相当浩瀚，在既定的条件下，这既非笔者的能力所及，也为讨论专一问题的学术专著的篇幅所难以涵盖。因此，本书特以其中的一个较为主要的课题——国际储备作为研究重点，因为国际货币金融的各个方面均与国际储备存在非因即果的关联。这样，通过对国际储备的探讨，就可以使之与南北货币金融关系的宏大背景联系起来，以收到“豹斑”之效。

对国际储备的研究可以从许多方面着手，其中，国际储备需求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因为国际储备需求在一定界限内对实际国际储备量、国际储备的最优水平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决定作用。所以，有关国际储备需求的任何方面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国际储备的各个方面。

本书虽然试图通过对国际储备需求的分析来揭示南北货币金融关系，但分析的重点则放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国际金融学术界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已有浩瀚的文献和相当程度的成果积累，可以说达到了较高的成熟程度。但是相比较而言，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则还存在大面积的空白，有待于我们去填补。而且，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较之发达国家要更为复杂，所以研究的难度也更大。这自然使这种研究更有学术价值。何况，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乃至改革、开放，也可提供更多的借鉴和经验教训，因而又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这正是我选择本书题目的出发点。

从较广的范围来看，发展中国家既包括石油输出国，也包括新兴工业国。前者在两次石油提价中曾一度迅速集中了较多的财富，

而后者则已经成为或正在转向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经济结构。所以,这两类国家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已经出现了某种离散倾向,它们在对外经济方面受到的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但是,石油输出国和新兴工业国只占发展中国家的一小部分,而在与发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两类国家毕竟更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点。因此,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整体分析时并不需要把这些国家完全排除。但为使这种分析更具一般意义,我们自然应该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这两类国家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如此,本书在某些场合将更着重于对所谓的第四世界,即最不发达国家的分析,因为在贫富日益两极分化的当今世界,将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与发达国家作一比较,无疑具有更突出的对照意义。

由于作者学识所限,本书的某些观点甚至包括基本观点恐有偏颇之处,分析过程中的缺陷也在所难免。作者的用意仅在于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有关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从而推动这方面的研究。

与本书有关的研究项目曾得到英国学术院王宽诚基金(The British Academy K C Wong Fellow ships)的资助,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奚君羊

1997年8月

第一章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储备短缺 与国际储备需求的双重制约

第一节 国际储备短缺的症状分析

一、相对短缺

从整体上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储备问题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各个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其国际储备行为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西方学者阿格沃尔(J P Agarwal)曾根据最优国际储备量分析来检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储备行为。他建立的最优国际储备量方程式是:

$$R_{opt} = \frac{D}{\log p} (\log m + \log q^2 - \log q^1) \quad (1-1)$$

式中:

R_{opt} ——最优国际储备量;

D ——国际收支逆差额;

p ——逆差出现的概率;

m ——追加资本与产出的比率之商;

q^2 ——进口资本商品占资本商品的比重;

q^1 ——追加资本的进口构成。^①

阿格沃尔利用这一算式对 7 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最优国际储备量进行了测算(有关数字见表 1—1),结果表明,这些国家及地区的国际储备行为差异很大,如巴基斯坦的实际国际储备量(R)与最优国际储备量之差竟达负数 2.75 亿美元,而泰国却为正数 5.77 亿美元。此种反差不可谓不大。

表 1—1 部分亚洲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最优国际储备量

国家及地区	m	q^1	q^2	D	R	R_{opt}	$(R - R_{opt})$
斯里兰卡	0.70	0.35	0.07	50	42	141	99
印度	0.50	0.43	0.05	158	1 006	648	358
巴基斯坦	0.65	0.40	0.07	151	199	474	275
菲律宾	0.26	0.60	0.14	73	251	295	44
韩国	0.78	0.85	0.24	75	610	163	447
台湾省	0.38	0.77	0.21	35	624	114	510
泰国	0.33	0.62	0.20	105	916	339	577

注:表中 D、R、 R_{opt} 、 $(R - R_{opt})$ 栏的单位为百万美元。

在国际储备的其他方面,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同样十分突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资料来看,有些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塞浦路斯和乌拉圭等持有的国际储备与其进口值的比率始终相当高,而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洪都拉斯、秘鲁、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这一比率却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准。

显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储备行为方面的差异是不能借助于统计学的平均算法来加以消除的。正因为如此,有些学者认为,对于就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储备是否短缺这一命题很难作出一般化的结论。^②

① 该方程式的推导过程及理论意义可参见 J P Agarwal, "Optimal Monetary Reserv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CVII (1971)。

② 参见 Graham Bir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d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1982, 第 111 页。

确实,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因各自的具体情况不一,其实际国际储备量无论是在绝对数还是在相对数上均未表现出完全趋同的迹象,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抽象掉这种差异的基础上,通过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以及其他各个侧面的分析来得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即发展中国家一般地存在国际储备短缺的症状。

从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储备量不仅在绝对数上表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而且在速度上也与发达国家大致保持着同步的状况。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的某些相对指标,如国际储备与进口的比率甚至还高于发达国家。但仅仅由此来观察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储备状况未免有失偏颇,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储备量虽然在不断增长,但占世界储备量的比重却始终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且自 70 年代末起呈下降趋势。这种状况说明,只要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储备增长速度不能持续大幅度地领先于发达国家,那么,其国际储备的相对软弱地位就永远无法改变。尤为严重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储备主要表现为外汇储备,而发达国家的国际储备中的黄金比重相当高,所以,如果黄金储备按市场价格计值的话,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储备与进口值的比率便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这说明,如以发达国家的国际储备水平为衡量标准,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储备确实存在相对短缺的现象。

二、负债较多

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相对短缺的第二个症状是其国际储备中含有较高的负债成分。

国际储备从其最终的所有权来看可划分为自有储备(owned reserves)和借入储备(borrowed reserves)。自有储备的最终所有权属于本国货币当局,因而可以自由支配,其主要来源是经常项目顺差;而借入储备的最终所有权则属于非本国居民,主要来源于国际信贷。借入储备具有最终返还的特点,因而在信贷期满时必须按

期重新融资,并且还须以支付利息为代价。在贷款期限较短,利率、汇率剧烈波动,下期的筹资又缺乏可靠途径的情况下,重新融资不仅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且也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与国际储备作为缓冲库存(buffer stock)而应该具有稳定的价值的内在特性也是相冲突的。

借入储备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与一国的资信有密切的联系,而一国的资信又转而受既定的国际储备量的影响。当一国的国际储备大量流失时,它的资信也会随之迅速下降,与此相应的是借入储备的来源也开始枯竭。因此,借入储备的来源往往是在一国最迫切需要的时候告罄。

这种情况说明,与自有储备相比,借入储备是很不可靠的。国际储备能否真正发挥其稳定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自有储备与借入储备的比例。

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的一个普遍特点是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因此其国际储备只有在后者大于前者的条件下才能形成。这不能不使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储备具有借入储备的特征。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和得到官方担保的对外负债一般比其持有的国际储备大好几倍。因此,从履行偿债义务这一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可以说并没有任何“自有储备”,其所有的国际储备均可看作是“借入储备”。而且,自8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债务结构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短期信贷相对增加,长期信贷相对减少。所以,要是仅从自有储备来考察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储备地位的话,则其国际储备的相对短缺的严重性尤为触目。

三、包含积累因素

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短缺的第三个症状是国际储备中包含了较多的资金积累因素。

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主要集中在不能再生的矿产资源,一

且这种资源消耗殆尽,外汇来源就会枯竭。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这些发展中国家就必须事先积累较多的外汇资金,以便在日后能不断获得外汇形式的利息收入。此外,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因而都对国内投资进行程度不同的计划管理,而投资项目所需的技术设备又往往需要依赖进口。例如,为了实现农业的绿色革命就需要进口大量的化肥;水利灌溉、桥梁公路和发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需要有足够的外汇投入,以保证必需的进口。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计划投资的实施,就必须事先积累一定量的外汇资金。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这种用于积累的外汇资金一般并不投资于长期资产,而是投资于流动性较强的资产,以便及时应付不测之需。按照统计口径,这种流动资产一概归入国际储备之列。如果剔除这一因素,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储备短缺现象自然更加突出。

四、存在隐性逆差

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相对短缺的第四个症状是国际收支存在隐性逆差。

当一国的对外交易能较为充分自由地进行时,该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可直接通过统计数字得到显示。这种逆差就是外在的显性逆差,即外显逆差。但是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持关系到经济增长的进口的低成本,又要避免进口过多的消费品而浪费宝贵的外汇,还要促进本国的出口。在这种互相冲突的目标中,唯一可行的协调措施只能是高估本币汇率,同时实行包括复汇率在内的进口管制和外汇管制。采取严厉的直接管制措施虽能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的目的,但这只是使逆差受到人为的强行抑制,并未在根本上得到消除,因而内在的隐性逆差,即内隐逆差依然存在。一旦取消管制,这种内隐逆差顷刻之间就会转化成外显逆差,国际储备也会大量流失。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储备是借助内隐逆差得到维持的。这说明,

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际收支逆差要比统计数字所指示的逆差更为严重。

五、绝对短缺

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的相对短缺是整体分析的结果,如果我们从更为具体的角度出发,通过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国家进行考察的话,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还存在国际储备绝对短缺的症状,即其实际国际储备低于应该保持的最低水平,甚至出现负数。当然,无论是从国际收支表来看,还是就货币当局的实际持有量而言,国际储备均不会成为负数。这里所谓的“负数”只是出于理论分析的需要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一国的对外当期偿债额大于其国际储备持有量而形成的一种差额,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该国的国际储备量已不足以履行偿债义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自然有理由认为该国的国际储备实际上出现了负数。

从某些时期来看,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其国际储备也可能迅速降至绝对低点,并出现负数的现象。例如,牙买加从 1973 年起,由于进口商品价格不断上扬,其国际储备随即开始迅速下降。1974 年 9 月,牙买加的外汇储备已低至 1.68 亿牙买加元,到 1976 年 3 月开始出现负数(负 190 万牙买加元),至年底,外汇储备负数已高达 1.81 亿牙买加元。面对这种险情,牙买加政府采取了一切可行的外部融资手段,并结合实施了一些调节措施。尽管如此,但迫于国际环境的不利变化,牙买加的国际储备状况非但没有改观,反而更加恶化,到 1978 年,外汇储备竟亏空 4.47 亿牙买加元。^①除了牙买加以外,其他如墨西哥、巴西等国均曾发生过外汇储备完全耗尽的现象。

如果说上述拉美国家的国际储备的绝对短缺还只是偶然的现

^① 有关牙买加的外汇储备的数字均系引用牙买加银行的统计数字,参见盛愉:《国际货币法概论》,法律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1 页。

象,那么,处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则更是持久地陷于国际储备的绝对短缺之中。这些国家有时甚至连进口必要的粮食以免发生大规模饥馑的资金都不敷使用,更谈不上保留充足的国际储备了。例如,斯里兰卡、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自 70 年代以来,其国际储备与进口的比率经常低于 10%。^① 这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国际储备只能满足一个多月的进口所需。

六、统计失真

从统计数字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短缺的严重性,但更为严重的是,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持其在国际信贷市场上的资信,因而常常夸大所公布的国际储备量。例如,墨西哥财政部长在 1982 年 8 月 12 日曾通知美国财政部:“墨西哥的外汇储备在下一个星期一就将全部耗尽。”^② 然而在 1982 年的下半年里,墨西哥对外公布的国际储备量却一直高于 81 900 万美元。

另一个例子是巴西。在 1982 年第四季度,巴西的中央银行在纽约进行的每天的清算交易中有好几次拿不出现款来清偿巴西的银行的债务。但在该年年底,巴西公布的外汇储备仍达 33 亿特别提款权。^③ 另外,菲律宾也曾直言不讳地承认其公布的国际储备量夸大了 6 亿美元。^④

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公布数的夸大并非纯属无中生有的凭空捏造,而是根据需要人为地改变统计口径的结果,所

① 参见 S Dell & R Lawrence,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Adjustment Proce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1980, 第 50 页, IMF,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September 1986, 第 19 页。

② 参见 R Timothy McNamer, "The International Debt Problem: Working Out A Solution", December 5, 1983, Remarks before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Trade Conference, Philadelphia Pa.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第 6 页。

③ 参见 John Williamson, "A New SDR Allocati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March 1984, 第 17 页。

④ 参见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6, 1983, 第 4 页。